

■ 政策解读

多重利好因素促前三季度工业利润快增

■ 本报记者 李海楠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9713.4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比1—8月份减缓1.5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利润增长4.1%。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在解读2018年1—9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时表示,企业成本降低、资产负债率下降等因素致使前三季度工业利润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新增利润主要来源于钢铁、建材、石油、化工行业。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企业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且增速总体维持较快态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核心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随着国家层面一系列鼓励企业去成本政策的落实,未来企业盈利持续改善的前景仍然光明,有助于提升各方抵御经济下行压力,促使经济趋向好的信心。

企业成本和负债率双双降引关注

每每谈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表现往往更加吸睛,毕竟,其肩负着我国整体经济形势表现优劣的重担,与宏观经济整体形势的表现和前景更是密切相关。数据显示,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294.3亿元,同比增长23.3%;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5.9亿元,增长4.8%;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088.8亿元,增长19.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352.8亿元,增长5.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1.5亿元,增长9.3%。

不难发现,规上工业企业的表现向好奠定了工业企业利润整体实现快增的基调。“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6%,上半年增长17.2%,前三季度增长14.7%,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4%,同比提高0.29个百分点。”何平在分析工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时表示,企业成本下降和资产负债率下降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

92.6元,同比下降0.31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31元,同比下降0.29元。

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7%,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同比降低1.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降杠杆成效更为显著。何平指出,从9月份当月情况看,主要受工业产销增速放缓、价格涨幅回落、上年利润基数偏高等因素影响,工业利润增速比8月份减缓。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业企业利润新增中,主要来源属于钢铁、建材、石油、化工等传统中上游行业。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钢铁行业利润增长71.1%,建材行业增长44.9%,石油开采行业增长4倍,石油加工行业增长30.8%,化工行业增长24.5%。5个行业合计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72.4%。

有分析指出,传统中上游行业利润快增支撑工业利润增长,意味着近期中上游相关周期类行业仍具备盈利支撑。预计随着CPI和PPI

剪刀差收窄,也将有利于盈利向下游传导,届时,工业企业利润仍将维持快增态势,继而对整体经济形势形成利好。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利好企业盈利能力

“数据的向好表现至少表明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经济趋稳态势日益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包括企业利润增速平稳上涨、成本持续降低以及资产负债情况的持续好转,都是短时期内受到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促进工业表现实现向好结果的正面因素,长远来看,依靠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仍旧可对工业利润乃至整体经济形势报以期待。

王晋斌认为,要实现这样的转向目标,必须依赖于当前一系列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发力。例如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真正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以持续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综合前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

表现,官方也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继续显现,新动能加快成长”的论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新产业实现增长较快。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和8.6%,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4和2.2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2.4个百分点。企业经营成本和杠杆率可降低。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39元,同比减少0.35元。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虽然经济指标呈现出向好趋势,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面对的。”王晋斌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减税、降费等具体措施实现企业降成本。除了依靠具体的减税、降费措施,类似于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降低负债率、简政放权改革等一系列举措都可以为当前面对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企业,确保拥有合理的

利润空间。

在王晋斌看来,当前的政策正在试图通过一系列努力和具体举措,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促使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尽量轻装上阵。他指出,近年来,去杠杆始终是重要任务之一,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更肩负维持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任。其中,对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而言,必须确保实体经济有钱可赚。“即解决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衔接问题,又要确保一、二、三产业都有平均的收益率,现在,第二产业工业企业的利润压缩得很厉害,在劳工和技术未来成本上升的同时,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甚至无利润可赚。”

“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减税、降低负债率等具体措施,确保企业保有应有利润。”王晋斌说,供给侧改革和有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都会为企业未来拥有更加可持续的盈利能力营造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也是现阶段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确保企业保有信心的必然之举。

□□□□□□□□□□(上接1版)

五是建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体制。确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体制,建立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四个负责制”,建立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六是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七是创新农村财税制度。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制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八是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发展农业保险和农村保险。

九是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拓展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

十是加强和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强化涉农执法体系建设,加强执法监督和司法保护。

农村改革带来了四大历史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40年的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请您了解和观察,有哪些变化呢?

宋洪远:40年的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回顾整个改革历程,突出表现为成功实现了四大转型。

一是从农业看,增加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构建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了从改造传统农业到建设现代农业的转变。

二是从农村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强化公共服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加强社会建设的转变。

三是从农民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了从增加经济利益到保障民主权利的转变。

四是从城乡关系看,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了从破除二元结构到推动一体化发展的转变。

农村改革积累了五条基本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40年的农村改革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为我们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借

鉴。据您理解和观察,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呢?

宋洪远:总结农村改革40年的实践,有五条经验值得我们汲取,也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借鉴。

一是始终坚持巩固和完善农业基础地位。我国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不断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安全稳定发展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始终坚持维护和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我国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行村民自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确保了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是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我国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农村已进入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阶段。

四是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党管农村工作、乡村社会管理、村民自治有机统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党管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形成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 政策微评

■ 李海楠

近日,随着冬季供暖期的临近,雾霾天气多发频次亦“如约而至”,一时间让社会上关注蓝天保卫战的讨论再度升级,有观点认为,大气污染防治的一系列举措按部就班地实施数年,换来的仍旧是“天气变冷、雾霾就来”的尴尬境遇,究竟我们距离打赢蓝天保卫战还差多少距离?

这样的疑问似乎也困扰着全体居民以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施政者。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外公布。《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经过3年努力,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0年,

■ 记者观察

扩内需仍是关键 多地出台更多促消费扩投资政策

■ 本报记者 童彤

近日,随着2018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各个地方也在陆续公布地方经济数据,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时间节点进入一年的第四季度,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各地一致的目标和主旋律,而在路径选择上,内需依旧成为当家主角,成为各地意在加以深度刺激的施策领域。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各地经济普遍运行平稳,其中,广东、贵州、湖北、浙江等多个省份前三季度GDP增速跑赢全国。而在政策层面,以上地方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更多政策实施重点置于更多促消费和扩大投资等方面。

比如,广东提出,要抓紧制定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多渠道扩大内需,大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千方百计稳定外贸增长,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又如,浙江也对外发出了全力冲刺四季度、努力实现全年红的动员令。明确提出,作为冲刺年度目标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打好有效投资项目落地攻坚战。要全力争取民间投资、交通投资、生态环保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平稳增长,全力争取投资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确保完成全年投资目标

打赢蓝天保卫战需要更多耐心与决心

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此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被划入了重点区域范围。

截至目前,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甘肃、宁夏、安徽、江苏等多地陆续出台“地方版”行动计划,明确了各地的“作战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地方出台的行动计划中,也制定出了更加细化的目标。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河北提出,到2020年,全省市区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较2015年下降28%以上,较2017年下降15%以上,达到55微克/立方米。其中,石家庄、邯郸、邢台市力争退出全国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10位,唐山、保定市力争退出后20位,衡水、廊坊、沧州市确保持续向好、位次提升。

天津提出,到2020年,全市PM2.5年均浓度将达到52微克/立方米左右,全市及各区县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1%,重污染天数比2015年减少25%;北京则按照“同步改善、功能区趋同”的原则,确定了各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目标。

目标已定,落实为重。在《行动计划》公布以前,生态环境部也在今年6月印发了《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方案》,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支执法铁军,对横跨今年和明年的重点区域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落实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加以监督和约束,可以

预见的是,这样的执法形式将于《行动计划》的时间节点保持一致。

近年来,决策层针对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一直主张施以涵盖政策法律在内的组合拳,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确保既定环境目标迈进,防止倒退,然而,按照此次强化督查的有关安排,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见的治理成效,但仍有个别区域逆势而为,客观上凸显了治理形势的严峻,亦传递出须对环境守法予以强化的迫切性。

笔者以为,既然相关行动安排和监督落实的执法环境都已明确,那么,确保打赢蓝天保卫战,需要的则是地方执行者的决心与监督执法者的耐心,剩下的,就该交给时间来交出最终答卷。

任务。

应该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增大,扩大内需早已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要求逐渐渗透到了地方实施政策安排的重要基础,毕竟,在外需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如何准确激活内部需求,重点从消费和投资层面着手发力经济增长,早已成为地方施政者的头号任务。

当然,仍有必要加以提醒的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毕竟,投资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下一阶段必须加以转化成生产能力,再逐步形成供给才能形成经济的有效闭环。而一旦由供给带来的产品遇到消费需求不足,所生产出的产品就会增多,然后出现库存,继而导致物价下降和通缩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在选择政策重点时往往会把促进消费作为首要任务,因为只有最终消费需求培养起来,才可能真正拉动投资需求的释放。即必须促进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匹配,确保由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能够被国民消费需求所消化。

一直以来,我国内需结构长期存在投资、消费失衡问题,其根源就是投资长期快速增长,而消费却长期不足。因此,发挥消费对经济

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也逐步成为近年来国家政策的一贯导向。只有消费需求得以扩大,继而对投资形成呼应,困扰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才会逐步解决。

所以,地方早已形成了先促消费,再扩投资的基本政策逻辑,而消费就是扩大内需的核心也已经内化成了一系列政策实施的灵魂。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然而,当前消费需求的缓慢释放还不足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样,这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缓慢释放正为扩大消费带来较大空间。

在记者看来,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在激活消费需求的政策安排上,考虑当前宏观经济环境,扩大消费需求释放仍然要遵循以下四个有效途径: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对企业减税并达到提高员工工资的目的;二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消费,改善消费环境;三是出台鼓励、刺激消费政策;四是健全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者信心。

而在投资方面,在以往房地产投资领头带动地方投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当下,需要树立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扩大有效投资的理念,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

施,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等基础设施上要加大对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注重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记者认为,一直以来,我国长期形成的投资过多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导致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需要通过加强对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文化产业等服务业的投资,达到优化投资机构的目的,这不仅有助于平衡因当前房地产行业调控带来对投资的不利影响,更有助于新型城镇化以及投资需求的持续释放。

需要说明的是,在扩大投资的过程中,有效投资是指能够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更多投资项目,这也将为带动民间投资形成利好,比如,对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投资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卫生等领域,均可有效遏制当前投资下滑趋势。

实际上,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国家层面,在部署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共同扩大内需释放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而无论国家从制度层面给予足够的宽松环境,也需要地方将政策不打折扣地加以落实,方能在消费端和投资端确保内需释放,如此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度过经济下行期,通过自身的坚定转型带动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地发展。